

赶考路上的“人民至上”

一首红歌与一种精神

1949年3月23日,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。几乎与此同时,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,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——西柏坡,向北平进发。

“民心不可侮”

1949年3月23日上午10时许,由11辆吉普车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,从河北西柏坡出发了。登上那辆敞篷吉普车,毛泽东回头深情地望了望西柏坡这个小村庄,再次重复说,进京赶考去!

春风习习,杨柳依依。车队过灵寿县,行经唐县,奔曲阳县……行进途中,毛泽东兴致很高,和同车的警卫人员谈古论今,不时引得卫士们哈哈大笑。

汽车进村时,马达的轰鸣声吸引了不少人走出家门来看热闹。有个妇女带着孩子朝着车队指指点点。前面的前卫车上,一名警卫战士连声喊:“看车!看车!注意安全!让一让,让一让!”司机也直接喇叭。带孩子的那个妇女不仅没有动,还和孩子朝着车辆比画,卫士朝她喊:“赶快回家去,进你们家去!”毛泽东有些不高兴,对卫士说:不能这样,会吓着他们的。同时又对司机说,慢一点,开慢一点。

车子从妇女和儿童的旁边驶过,毛泽东朝他们招手。他们虽然认不出车上坐的是谁,但仍朝汽车招手。

毛泽东对身边的卫士们说: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伤害群众,刚才那个妇女很可能被吓着了,她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车队,让他们看看有什么要紧的。这些年,我们还不是靠这些老乡、这些老根据地人民养活的。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——“民心不可侮”。

当晚,毛泽东就住在了村里抗日烈士李登魁家的老宅子里。毛泽东的卫士回忆:“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,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,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,趴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。”

第二天早上,车队迎着朝阳出发。听说保定要举行庆祝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大会,毛泽东皱起了眉头,连声说:不好,我们一定要把市场迁回来。”王成俊说:“好,我们一定要把市场迁回来。”当天晚上,叶剑英、滕代远等领导同志来到涿县,迎接毛泽东、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

3月24日上午11时许,中央的车队到达冀中



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。(资料图片)

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市。

“先要从群众最需要的抓起”

车队离开保定,一路向北,经徐水、定兴、新城,到达号称“天下第一州”的涿州(县)。

车到涿县时已经是傍晚。

这里城门紧闭。守卫的哨兵站在车队前面,挥手示意停车。前卫车上的工作人员告知哨兵,他们是中央领导车队,请放行。哨兵却坚称:“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,不管你是谁,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。我们要执行命令!”

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赶考路上吃的一个“闭门羹”。

这时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已经离他们很近。卫士长欲上前交涉,毛泽东却拦住了,说:“他们做得对,不要紧,可以等一等。”

直到中央机关前站的同志和涿县的负责人从城里赶来,哨兵才敬礼放行。进城后,毛泽东看着街道两边挂有招牌的店铺大多关门,街上显得冷冷清清。他问涿县委书记王成俊:“涿州城里的这些商店怎么都不开门?”

王成俊说:以前国民党驻军为了城防,把所有商户都赶到东关去了,不让人们进城来。现在涿县刚解放,工作头绪太多,一时还没顾上把这些商户迁回来。

毛泽东态度十分明确:“刚解放,工作千头万绪,先要从群众最需要的抓起,应该学会掌握城市工作的规律,马上把市场迁回来。”

王成俊说:“好,我们一定要把市场迁回来。”当天晚上,叶剑英、滕代远等领导同志来到涿县,迎接毛泽东、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

总部机关。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也赶到了,毛泽东见到他,笑着说:“刘亚楼也来迎接我们进京赶考啦。”刘亚楼还是第一次听到“进京赶考”这种说法,不免一怔。周恩来解释说:主席是要我们不要当李自成。

刘亚楼恍然大悟,说:“我们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!”

叶剑英汇报说,为迎接党中央迁到北平,准备搞个隆重的入城式。毛泽东听后,认为北平和平解放时已搞了入城式,我们进城就不搞了,声势不要搞得太大,不要惊动老百姓。我们进北平,不用宣传全世界也都知道,不必花银子搞仪式了。

周恩来很理解毛泽东的心情。他说,同志们已经准备好几天了,要不这样吧,我们不进市区,可以在郊区搞个小型的阅兵式,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,大家见个面,也算出个安民告示。毛泽东这才点了点头。

3月25日凌晨2时30分,毛泽东一行离开了涿县,改乘火车前往北平。清晨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。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、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前往迎接。他们接毛泽东一行先到颐和园休息。

毛泽东一行进入颐和园后,看到偌大的一个园林里空空荡荡,没有一个游人,显得非常冷清。毛泽东无心欣赏园中风景,问身边陪同的人:“公园里怎么没有人呢?”

“这里原来住着几个和尚,还有一些看管园子的人。为了您的安全,社会部把所有在颐和园住的人全部清理出去了。”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回答。

毛泽东听了,很不高兴,停住脚步,批评说:“这里是公园,不是私园。把人都赶出去,把水都排光了,没有水,鱼怎么活?还讲什么安全?”毛泽东把刚刚接管颐和园的管理处主任柳林溪招呼到身边,仔细询问接管工作。这里有多少旧职员、多少工人,有没有太监,他们的生活怎么样,有没有困难,等等。柳林溪一作了回答。

柳林溪说:“我们接收旧职员20多人,工人30多人,没有太监。他们中年轻人很少,大多是五六十岁的,生活比较艰苦。北平被包围时,全国职工工资都领不到。当时就要过春节了,职工无法过年。我们进城接管后,了解到这一情况,立即报告了市政府,从市政府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,大家才过了个年。”

毛泽东说:“那很好!对原有职工的生活,我们要包下来,不要辞退他们,原薪是多少,还发多少。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,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。如果那样就不好了。”

毛泽东关心的不仅仅是颐和园几十个旧职员的生活,想得更多的是新中国成立后,怎样把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大批旧职员安顿好,让他们为建设新中国出力。

别开生面的阅兵

1949年3月25日下午3时,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颐和园出发,4时30分左右到达了西苑机场。

从各地赶来北平的各界代表,也都已云集西苑机场。聂荣臻、叶剑英等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介绍各界代表。

毛泽东与华北妇女代表李秀真握手时,聂荣臻介绍说:她在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下翻了身,是华北的拥军与生产的模范。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,给解放军传递情报,并将自己的独生子送到了部队……特意她参加西苑阅兵。毛泽东和她紧紧握手,足足有3分钟。

随着机场上空升起4颗白色照明弹,阅兵正式开始。

阅兵的车队缓缓驶入阅兵场时,军乐大作。这是一支由第四野战军宣传骨干组成的军乐队,也是一支来自“五湖四海”的队伍,其中有人民军队成长起来的乐手,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,有被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中的乐队成员。演奏的阵势和雄壮的乐曲,把人们带进了一种庄严的氛围中。

检阅车队从严整的队伍前面缓缓驶过。随着一声“敬礼”口令,站在队前的领队举手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敬礼,战士们注目礼。乐队奏起乐曲。经历无数艰苦战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,以全部存自敌军的美式装备接受检阅。

随后,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乘汽车离开西苑机场,返回颐和园。

3月26日晚上,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进驻香山。至此,“进京赶考”的队伍,全部进入了这个对外称为“劳动大学”的地方。

(摘编自《党史博览》文/董保存)

莽莽兴安奏凯歌

——赵尚志率领北满地区东北抗日联军四次远征纪实



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赵尚志将军纪念馆。(资料图片)

1936年至1939年,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实施“三年治安肃正计划”,投入更多兵力,采取更加严酷的手段,主要针对伪满洲国东部的三江、滨江、安东各省及奉天省东南部的东北抗日联军,发动了大规模军事“大讨伐”。面对敌人的疯狂“讨伐”,在三江、滨江省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总司令赵尚志提出了“远征”构想,以“保存实力,突出包围,广泛游击,开辟新区”为反“讨伐”斗争策略,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战术,4次率部远征,穿梭于小兴安岭密林中,插入敌人统治薄弱地区,历经大小百余战,杀敌千余人,攻克城镇二十余座,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弹药,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。

第一次西征旗开得胜,打开松花江两岸武装抗日斗争新局面。1936年4月上旬,由抗联第3军300余人组成的首批远征队伍在赵尚志率领下,由汤原县浩良河向西向通河、木兰、巴彦、东兴等地进发。途经位于松花江左岸的舒乐镇(今依兰县舒乐村),此处驻有日军守备队1个中队30余人及伪军警察200余人。为开辟远征通道,赵尚志决定摧毁敌人的这个重要军事据点。战斗发起前,赵尚志派出70余名手枪队员,乔装成镇上居民和伐木工人潜入舒乐镇,隐藏在敌人驻地周围。他们与进攻部队里应外合、内外夹击,很快该镇被一举攻克,俘日军20余人,伪军和伪警察80余人,伪警察署长被击毙,缴获步枪百余支。19日,远征部队沿松花江向东北行

北为目标进行远征。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,远征部队不仅要克服恶劣的天气条件,还要躲避敌人飞机、大炮的袭击,但远征将士们始终保持高昂士气。在赵尚志指挥下,远征部队分路出击、相互呼应,与敌人在山里山外周旋,先与驻海伦的日伪军警交火,后在海伦哈拉巴山(今海伦县双禄乡境内)与日军岛部队斗争,以勇敢顽强的革命斗志取得了诸多胜利。

1937年3月7日,正是乍暖还寒之时,赵尚志率部300余人行至通化县境内一处名为黑风口的山沟,因冬季附近的山泉水流在沟内结成一片冰川,人们也把这里称为“冰趟子”。此时沟里是白雪覆盖的平坦冰川,沟两侧是山林,沟口狭窄,既可设伏打援,又可断敌退路,地形于我十分有利,赵尚志决定在这里伺机设伏,彻底扭转敌人一路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。他命令部队分左右两路继续前行,制造上山假象,再沿山脊秘密折返,埋伏在树林中等待来敌。当日军700余人的队伍沿山路追来进入伏击圈后,远征部队战士用机枪猛烈扫射,日军在冰面上被打得人仰马翻。敌人在连续发起3次进攻均被我军击溃后开始撤退,逃到沟口处又遭我军堵击,伤亡惨重。远征部队以牺牲7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300余人,日军队队长守田大尉等6名头目均被击毙,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物资。

第三次远征分头突击,化被动为主动掀起东北抗日运动浪潮。在日寇残酷镇压和封锁下,北满地区的抗联部队长期孤悬敌后,与党中央失去联系,与关内相互隔绝,抗日游击运动进入异常艰苦阶段。然而,赵尚志率领的北满地区抗日联军仍坚持克服万难冲破敌人“讨伐”,以巩固旧的抗日区域,开辟新的抗日区域。

1937年7月至10月,第3军第1、3、5师在松花江右岸依兰东部、第4师在宝清等地开展对敌斗争,他们与吉东抗联部队相呼应,搅得敌人不得安宁。第9师在汤原西部活动,毙敌百余名,俘虏数百人,缴获轻重机枪6挺,炮1门,子弹数万发。第6军第1师在富锦、宝清、桦川一带积极开展开辟新游击区,攻克了富锦县太平镇、宝清县凉水泉子。第6军第5师在绥滨、富锦、同江一带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和“集团部落”计划,使敌遭受巨大损失,并于古城岗设伏袭击了日军德田指挥官所率“讨伐队”,获得大胜。第6军主力按照赵尚志的远征指示,在军长戴洪率率领

下穿越小兴安岭,到达绥棱、海伦抗日游击区,与第3军第6师配合,进攻海伦县叶家窝堡敌人据点,攻克侯家大屯,摧毁了当地伪警察署。第3军第4师与第6军第2师组成的模范师,挺进饶河、抚远境内,与抗联第7军配合,在乌苏里江沿岸不断袭击敌人据点,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。第9军第1师和第2师在依兰、方正、宝清等地分散开展游击战争,攻克了依兰五区草帽顶子,解除了伪自卫团武装。抗联部队通过远征积极开展游击斗争,胜利果实丰硕。与此同时,远征部队还组织和领导群众参与反日斗争,所到之处广大群众的反日斗争热情更加高涨。

第四次远征应对日伪“重点讨伐”,展现出坚定的革命精神。1937年秋冬季,日伪当局为了巩固侵华后方基地,实现其扩大侵略的野心,在大举进军关内的同时,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残酷的法西斯式“讨伐”,并将赵尚志率领的第三军列为“重点讨伐”对象。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组建了约5万人的“讨伐军”,企图在松花江下游三江省一带消灭抗日联军有生力量。自10月下旬起,敌人向汤旺河流域展开进攻,多处抗联密营接连遭到侵袭与破坏。考虑到一旦敌人集中力量对我军继续围剿,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,赵尚志根据多年来数次反“讨伐”的经验教训,一针见血地指出:敌人“更残酷的毁灭”即意味着对“反动统治深恶痛绝”,因此,粉碎日伪“讨伐”的有效办法就是再次远征。

按照赵尚志的提议,在北满的抗日联军各部,除在哈南、哈东及松花江左岸仍留一部分兵力外,大部分都参加远征。其中,第3军第1师、第6师分头向嫩江平原挺进,占领大兴安岭及讷河、布西、拉哈一带,第3军第5师则游击于海伦、通北、德都、龙门等黑龙线路。这几支远征部队到达黑嫩地区后,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,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果。而活动在三江地区的吉东抗联部队及北满其他部队,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果敢执行远征计划,在敌人“大讨伐”中遭受较为严重损失。由此可见,赵尚志的革命预见和远征战略经得实践检验。

(摘自《中国国防报》文/王凤春 魏红艳)

“旁听课”引路季羨林

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羨林,能够做大学问,成大事业,有大贡献,得益于在清华求学时的几门“旁听课”。

1930年,季羨林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。外文系对选修课要求较为宽松,于是季羨林经常去旁听外系的课。他曾旁听过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郑振铎等人的课。有一次,他和同学慕名去听冰心的课。冰心当时非常年轻,满脸庄严,不苟言笑。她看到教室里人满为患,知道其中有“洋”,就严厉地说:“不是本专业的学生,下节课就别来了!”季羨林自觉无趣,从此不敢再进冰心的课堂。

旁听郑振铎的课,却有意外之喜。郑先生豁达大度,待人真诚,没有名教授架子。季羨林、吴组缃、林庚、李长之等人因为听课,与郑振铎成了忘年交。后来,作为特约撰稿人,他们的名字赫然印在《文学季刊》的封面上,几个人都倍感受荣。

让季羨林受益终身的,是旁听陈寅恪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课。陈寅恪身穿长袍,朴素无华,脚下穿一个布包,里面装满讲课用时的书籍和资料,这给季羨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陈寅恪是考证大师,讲课时,“他总是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,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、考证、分析、综合,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。他的分析细如毫发,如剥葱叶,愈剥愈细,愈剥愈深,然而不断,不夸大,不歪曲,不刻意章取义。仿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,盘旋曲折,山重水复,柳暗花明,最终豁然开朗。听他的课,简直是一种享受,无法比拟的享受。”陈寅恪的这种学风,影响了季羨林的一生。

季羨林后来回忆说:“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,令我终生难忘,终身受益。选修的是陈寅恪先生的‘佛经翻译文学’,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‘文艺心理学’。直至现在,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,显然是受朱先生先生的熏陶;而搞佛教学、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,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。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提携,我不会走上现在的治学道路,也进不了北大。”

(摘编自《人民政协报》文/王剑)